

学术专论

宣统年间出关苦工若干问题考析

杜丽红

【摘要】本文以宣统年间的出关苦工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苦工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工资差异，从经济角度解释了苦工的地区流向和职业取向。此外，通过分析中俄两国政府对待苦工的态度，阐释了苦工们在谋取到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俄罗斯人反感，受到驱逐，而且被东北地方官和舆论视为流民，不愿招垦入籍。从东北移民整体历史来看，宣统年间出关苦工处于中俄两国政府态度转折前夜，经济上有利可图。

【关键词】工资差异 苦工流向 苦工择业 官方态度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2)-04-0073-10

The Study of the Migration of Manual Laborers (*kugong*) to the Northeast during the Xuantong Reign (1908—12)

This article examines manual laborers (*kugong*), who moved from Zhili and Shandong to the Northeas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of Xuantong. The essay explains the *kugong's* choices of area and occupation economically, by comparing the discrepancies of earnings between the areas they left and the areas where they resettled. It also analyzes th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toward this migration. *Kugong* did accumulate some economic assets, which not only led to Russian antipathy but stimulated measures to drive the Chinese out. At the same time, local Chinese officials and newspapers regarded *kugong* as refugees and refused to allow them to reclaim land or establish official resid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east, the Xuantong Reign was the ev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changing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kugong* and it also represented an economic turning point.

清末，大量劳动力出关赴东北各地及俄国境内谋生，有的务农，有的务工，时人常将他们称之为“苦工”、“小工”或“苦力”。^①这些人因东北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开发的巨大经济吸引力自发出关谋生，既不是带有政策导向色彩的移民^②，也不是“四处游食”或“流为盗寇”的流民、游民^③。但他们常常被涵括在东北移民或赴俄华工为主题的研究中。^④本文选取宣统年间（1909—1911）为研究时段，就这一具体时段而言，若用移民或赴俄华工似难

以概括出其特性，故文中采用当时人所用“苦工”一词，意指那些出关后靠出卖劳力获取工资为生的人。由于这些苦工长期被称之为移民，缺少微观具体的研究，尤其是未能从经济角度研究苦工出关的动因，使得目前学界对苦工出关的原因、具体流向以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学理解释不足。文章利用锡良档案中有关东北苦工的资料，并结合当时报刊、方志资料，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不仅通过比较工资差异，剖

【收稿日期】2012-04-03

【作者简介】杜丽红（1973—），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析苦工的地区流向和职业取向，而且阐释了苦工的境况，他们在谋取到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俄罗斯人反感，受到驱逐和排挤，而且被东北地方官方和舆论视为流民，不愿招垦入籍。希望这样的研究能深化我们对东北移民及其社会经济背景的理解。

一、收入差异与苦工流向

清末，每年出关赴东北的苦工数量缺乏翔实统计。据估计，1904年进入东北的苦力在20万以上，1908年日本牛庄商务参赞的报告当年有20万以上的苦力出关。^⑤宣统三年（1911），官方认为直隶、山东两省赴关外工作者，“约有十数万人”。^⑥日人认为“苦力辈每年待开河后，由山东而渡来满洲者，恒不下三十万之众”。^⑦由上述资料推测，每年出关赴东北的苦工数量大概在20万以上。

从当时的官方电文和报纸报道可知，出关苦工中的大多数并未在东北工作，而是前往俄罗斯打工。^⑧究其原因，似乎是由于宣统年间东北的苦工需求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一是由于大型工程大大减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当时，在建的铁路只有齐昂铁路（齐齐哈尔—昂昂溪），其全长仅29公里^⑨。此外，还有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连京线改轨工程和安奉铁路改轨工程。这样的铁道工程规模很难与早期中东铁路修筑时的盛况相提并论。从苦工需求量来讲，中东铁路修筑估计有6万人^⑩，安奉铁路用工约有二千余人^⑪。二是日俄战争后，东北投资乏力，虽有新的企业出现，但难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尤其是俄国战败后，北满经济萧条，企业倒闭，劳动力需求下降。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仍停留在表面，解释力不够。毕竟当时东北正在大力招垦，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为何苦工很少开垦荒地呢？

如果要解释为何大量苦工主要流向俄国，可以借鉴经济学界对当代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成果，从收入差异的角度加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在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讨论中，指出了经济收入差异是重要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在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动

机驱使下所采取的一种资源重新配置行为。通过外出打工和异地就业，农村劳动力可以避免原居住地就业资源配置严重不足、劳动力收入明显偏低的现象，以实现劳动力家庭收入最大化”。^⑫还有学者指出，“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是根据收入均等化的理论。人们有一种往他们能够获得收入最高的职业或者地理位置流动的趋向，而收入差别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了非货币性的工作条件的差别。收入的差别构成了流动的动机，而流动的结果抹平了收入的差距。如果在能力相同的人们之间发现了收入的差别，那么或者他们的工作条件存在差别，或者在工作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存在某些成本”。^⑬需指出的是，工资差异不仅存在地区之间，而且存在于行业之间。收入差异促使人们从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在择业时选择收入较高的行业。这一理论成果对我们分析出关苦工的流向和择业选择将大有裨益。

以往有研究认为，赴俄华工多是破产、逃荒农民，受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⑭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从工资来看，虽然华工较俄国人低，但相对于国内的情况，确属有利可图。对此，徐恒耀的认识较为接近事实，他指出“山东地方因为一般劳力过剩，虽如何勤作所得的报酬总很有限，乃不得已离故乡，而远出到工资报酬较多的地方去谋生，而且这种迁徙的人不仅限于贫苦谋生不得的人，其中亦有可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发财的人。”^⑮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当时赴东北的苦工有谋生的，更有为发财而北上的。较为遗憾的是，目前尚无研究者比较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工资差异，运用具体数字来论证苦工的选择是基于最基本的个人经济取向。笔者通过查阅资料，找到了同年四地工资状况，为分析收入差距提供了数据支持。下面对直隶、山东、东北和俄罗斯四地的雇农、煤矿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日工资收入分别进行比较，进而说明出关苦工的流向。

首先，比较雇农的工资水平。1911年，山东烟台雇农每年工资50—60吊，约合大洋17.86—21.43元。^⑯据奉天农业试验场统计，1909年付给田场雇工的普通工资每天为美金一角二分半至一角七分，即每月为美金3.75

元至5元。^{①7}按照当年美元与大洋的比价1:2.22计算,^{①8}日工资约合0.28—0.38元,月工资为8.33—11.1元。根据井坂与庄村的调查,1909年—1910年北满农民日工的工资平均是大洋0.36元,年工的平均工资是37.73元。^{①9}从下表中可以看到东北日工的收入基本相同,由于缺少了山东日工的数据,难以做比较。仅能从年工资进行比较,东北的工资约为山东的2倍,对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讲,到东北做长工或短工是有吸引力的。

山东、奉天和北满雇农日工资、年工资比较表

单位:元

	山东	奉天	北满
日工资		0.28—0.38	0.36
年工资	17.86—21.43		37.73

其次,比较煤矿工人的工资状况。据相关统计可知,1910年山东的矿坑挖工日工资为0.40元^{②0},抚顺煤矿的日工资是0.423日元^{②1},俄国煤矿华工工资为1卢布^{②2}。按照当时的汇率比价,换算成大洋元后,具体数字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看到抚顺的煤矿较之山东并无太大工资优势,俄国煤矿的工资则远远高于山东、抚顺两地,几乎达到了3倍,对苦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10年山东、抚顺及俄国煤矿工人日工资比较表

单位:元

	山东	抚顺	俄国 ^{②3}
煤矿工人	0.40	0.47	1.14

再次,比较手工业者的工资水平。《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收录了直隶景县、山东和大连的工资水平。直隶景县当地手工业者日工资在0.09—0.11元之间,山东的平均日工资约在0.15—0.20元之间,大连的日工资在0.6—0.69元之间。

在俄罗斯,华工对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过多要求,报酬比俄罗斯人低,华工的工资只相当于从事同种工作俄国工人的60%。1910年滨海省从事公务劳动的工人工资情况如下:海参崴管理局所属俄国工人工资为1卢布到1卢布80戈比,华工工资只有60戈比到1卢布;在筑港工人中,俄国木石工人工资为2卢布到3卢布60戈比,华工只有70戈比到1卢布;苏前煤矿俄国力工工资为1卢布50戈比,华

工只有1卢布;海参崴移民点俄国工人工资为1卢布25戈比,华工仅有75戈比。^{②4}由上可知,华工每日工资在0.60—1卢布之间,按照当时卢布与大洋的比价1:1.14计算,约合0.684—1.14元,较之国内高出很多。此外,据当时报刊记载,黑河一带华工工资较高,“每日雇工价值不下俄洋七八角,多者能达一卢布”^{②5},或“冬春到者例能月得工资二十元,夏季麇集则不过十五元之谱”^{②6}。这些数据证实了上述工资的可靠性。

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山东的工资较直隶高五成到一倍,大连较山东高3、4倍,是直隶工资的6倍多,俄境工资较大连高五成,相当于山东的6倍,直隶的9倍。

1910年景县、山东、大连和俄罗斯手工业

日工资比较表

单位:元

	直隶景县 ^{②7}	山东 ^{②8}	大连 ^{②9}	俄 ^{③0}
木匠	0.11	0.15	0.60	0.912
泥瓦匠	0.11	0.15	0.60	0.912
石匠	0.09	0.15	0.69	0.912
油漆匠	0.11	0.18	0.60	0.912
铁匠	0.09	0.20	0.60	0.912

从以上各统计表可以看到,虽然在俄华工收入仅为俄国人的60%,但远远超过中国的工资水平,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国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如果说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和1897—1903年中东铁路修筑时,俄国需要在天津、山海关等地设招工处,以高工资招募工人。^{③1}那么,到了宣统年间,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大量工人自动涌入俄国寻找工作,挣得高于国内的工资。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从卜魁到俄国、法国,也不过十几天路。京城到黑龙江才五天火车,只要二十几块洋钱盘费。”^{③2}中国苦工乘坐火车北上,经黑河、嫩江、爱珲以及满洲里等边界城市前往俄国境内谋生。^{③3}戈拉韦考察队认为,在1900—1910年间,此类人数每年在7.5—20万之间波动。^{③4}按照前述锡良说法,每年前往俄国的苦工约在20万人左右。在此以黑河为例说明赴俄苦工的盛况。宣统元年,到达黑河的苦工有6万多人,宣统二年约有10万多人。每年春天是劳动力北上的季节,从宣统二年正月初至三月底,开江以前到黑河的华工已不下万数

千人，内中转入俄境者有万人。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一二的四五日内，由哈尔滨、伯力等埠江轮运载到达黑河口的华工每日不下五六千人，总计达两万余人。^③

高工资和诸多就业机会，不仅吸引大量中国苦工前往俄国谋生，而且吸引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俄居住华人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1905年12628名，1906年66612名，1907年81961名^④，1908年83191名^⑤，1909年达10万之上^⑥，1910年约15万人^⑦，1911年约14.4万余人。^⑧

二、收入差异与苦工择业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对苦工的择业亦有重要影响。这部分将通过比较东北和俄罗斯境内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分析出关苦工的择业取向。

宣统年间东北不同行业日工资比较表 单位：元

	农	煤矿	手工业
东北	0.36	0.47	0.60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的工资收入最低，矿工次之，手工业及一般劳力最高，但相差不大。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手工业的日工资是大连的，相对于其他城市较高。此外，日本人接管抚顺煤矿后，工人日工资呈下降趋势，从1907年的0.804元降至1911年的0.378元，仅为5年前的47%。^①东北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不是特别大，人们在择业上的倾向性不是特别明显。据调查，1910年左右东北地区的500人以上工厂雇佣了33080名工人。^②这些工人中部分由流动的苦工担任。

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对清末东北各地苦工的从业状况缺乏具体了解，只能通过长时段的研究了解大致的趋势。此处将利用锡良档案中有关直东两省苦工对地方经济影响的调查资料，了解苦工在各府县的行业分布状况。宣统二年十一月，东北鼠疫的蔓延，促使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积极防疫。为此，东北交通阻断，禁止苦工流动。为了解此项措施的影响，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锡良致电三省各府厅

州县，要求查明“究竟各属是否向有直东两省小工在境内营业，其人数几何，若绝对禁止，于各属生计上有无窒碍”。^③各地的回电报告了苦工与当地经济的关系，为我们了解宣统年间出关苦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锡良共计收到40个府州县的回电，根据报告内容统计，苦工较多的有22地。为方便阅读起见，笔者将相关资料制成表格。

各府县苦工概况表

地名	设置时间	苦工概况
洮南 ^④	光绪三十年	人民稀少，全赖各处小工来此雇工种地，年计数千，春来冬去。
通化 ^⑤	光绪三年	县属直东两省小工以木把为最多，现已达二千二百余名。
海龙 ^⑥	光绪五年	直东两省移家在境长住者计一千九百余人，夏初来种地者年约二千余人。
新城 ^⑦	雍正五年	新郡劳动事业，居民多数自任境内。虽有直东两省，工人咸各携家寄住，营业者居多数。
宁安 ^⑧ (绥芬)	光绪二十八年	府境地旷人稀，工作需人，雇工三千四五百人之谱，东籍占居七成。俱于春间自大连、营口起早前来，泥木各工及他项营业不过二成，余俱为人耕种，冬初或留或归，虽无定数，大约留者不过一成。
富锦 ^⑨	宣统元年	县属设治伊始，边荒待辟，户口星稀，所有境内垦种地亩及充各项劳动事业者，全赖直东两省之民。
长北 ^⑩	光绪三十四年	查直东两省历年来卑府营业及做小工者计有二千余人，其间尤以山东人为多，营业以充木把为大宗。
凤凰 ^⑪	光绪二年	查厅境内由直东两省来充安奉路工者约二千余人，其耕地、放蚕及各项劳动者亦约二千余人，大半仍住境内。
新民 ^⑫	光绪二十八年	新民雇工商家间有直东之人，然皆系永久性质，并无时来时往之人。农间几无雇用之事。
黑河 ^⑬	光绪三十四年	爱琿紧与俄邻，彼埠华工皆直东籍。
木兰 ^⑭	光绪三十年	查县境此项小工，上年间派人调查约六千余名，均系为人开种地亩，春来冬回，习以为常。
额穆 ^⑮	宣统元年	额穆地僻人稀。劳动社会半多直东之人。
阿城 ^⑯	宣统元年	查直东两省小工来县受雇种地，向在夏秋两季，来去无定，难核确数。
哈尔滨 ^⑰	光绪三十一年	与华俄两国作劳动事业者不下万余人，尽系直东两省小工。

续表

地名	设置时间	苦工概况
吉林 ^⑤	康熙十年	查府属所有直东人数向无确实报告，其营商者，直东人占25%，劳动者占80%，务农者占20%。
桦川 ^⑤	宣统元年	查直东人民在桦川县营业者五千余人，商居其二，农工居其八，多冬往春来。
五常 ^⑥	光绪六年	不通铁道，亦无大帮偕来。府属城乡居民客籍十居五六，津东两省实占多数，均有产业，多历年所。劳动小工散居村屯，并非新到府境。
安宁 ^⑥		以直东工人宁属，岁可收用三千余人，均系民间自雇主客相习，即有新工，须由旧工荐引方能信用，每岁收获后去留听便。
呼兰 ^⑥	光绪九年	呼兰向无蚕业、矿产。惟农工商三项，多系外来之人，商人向分津隶、山西两帮，习惯定三年回籍省亲一次，种地并各乡劳动工役。
巴彦 ^⑥	光绪三十年	州属劳动工人以直东人为多，然多系一任数年，其春来秋去者颇少。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东北各地的苦工主要从事耕地、放蚕等农业劳动，其次从事手工业及商业，仅有少量从事工程建设。在一些地方，由于发展得较早，苦工已经在当地定居，“咸携家寄居”。其中经商者多在当地成家，“均有产业”，不再春去冬归，而是“习惯定三年回籍省亲一次”。一般受雇的农民则因居无处所，常常春来冬去。

与东北不同行业之间工资差异不大情况相比，俄罗斯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较大，对赴俄苦工的工作选择起到了积极影响。下表显示了煤矿工、金矿工和一般苦力的日工资状况，可以看到金矿的工资高达每日约2元，几乎为煤矿和其他劳动的2倍，因此成为了中国苦工最愿意从事的工作。

1910年俄境内不同行业华工日工资比较表

单位：元

	煤矿	金矿	一般苦力
俄罗斯	1.14	2	0.912

在俄金矿工的收入有不同说法，据官方估计“每月收入有50卢布”，^④约合大洋57元。另据1910年俄税关调查，“远东矿工总计达三万九千余人，所得工资有四五百万卢布之谱”，约计人均年工资一百余卢布。^⑤除了工资

收入外，矿工还偷采荒金，估计“每年运往中国者不下三百万”。^⑥由于淘金有如此巨大的经济收益，故到达黑河的劳工“以入山淘金为生者居多，入屯堡雇工者次之”。^⑦

进入俄国境内的中国苦工谋生的首选方式是淘金业。据调查，俄海滨省各矿华工有15000名，布列音一处矿产，有华工3000余名。^⑧1913年华工占远东采金工人总数的87.6%。^⑨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数百名中国劳务前往俄罗斯远东采金场作工。经黑河赴俄淘金者都以黄河为目的，“该河以上各山沟中无不产金，如由四可拉得分路前往桦皮河东北及其邻甲大野鸡、窑沟、饶丹、东洞等，皆著名产金处，每年在该各处之华工不下数万余人，大半能淘金获利，结伴回家。凡就雇而来者，至黄河金厂则踪迹不复再前，故俗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谣’。”俄人调查记载，“在外贝加尔矿产资源开采搞得热火朝天。然而矿上的劳动力竟是一色中国人”。^⑩中国劳动力因其吃苦耐劳、对老板百依百顺、几乎连石头都能吃下的超人胃肠，再加上低廉的工资，把俄国劳动力排挤得无容身之地，“中国人已占去外贝加尔劳动力的半数，矿上全是中国人”。^⑪

第二种谋生方式就是在铁路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出卖劳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区段以及一些要塞、营房等军事和交通设施项目建设中，俄国大量使用了中国劳动力。乌苏里铁路建设依靠来自山东的劳动大军。每当春季来临的时候，满载山东劳工的轮船自烟台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年的人数高达一万多。他们从事挖土方、架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等。阿穆尔大铁路的建设，亦雇佣了中国劳动力。在修筑阿穆尔复线铁路经节牙河之四克拉得至李蛮子之早道一段，俄员在黑河四处张贴告示，在黑河左右两埠招募修路工人赴俄工作。^⑫

除了赚取工资外，赴俄苦工还从事商业及工矿业。据俄国殖民局出版的西伯利亚消息报调查，滨海省久居华商约有8万上下，阿穆尔华人多操果品、水菜商权。^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中国人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从集市上的生活必需品、杂品商贩，农村的小铺，到各城市

的大商店，与海滨省声气相通，往来贩运。中国商人不单是廉价中国和日本商品的出售者，而且是当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者，他们完全垄断着农村的商业活动，成为农村中的真正富农，他们把商品高价卖给农民，然后用低价收购用来抵债的粮食。华商在与俄商的竞争中，具备以下特点“简单适用的商店、廉价的伙计、克勤克俭的掌柜、超等的勤劳、机敏、有条不紊、分散投放资金，再加上团结和互相支持”。加之，采取微利策略，在与俄商竞争中占据了优势，“俄商反不能比较万一”。滨海省的487个工矿企业中，完全掌握在亚洲人手中的就有192个。^④

三、中、俄官方对待苦工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高工资的吸引下，大量直隶和山东的劳动力前往出关谋生，其中绝大多数流向了俄国西伯利亚。我们认为，这可视为农村劳动力在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动机的驱动下所采取的一种资源重新配置行为，但这种行为的盲目性不仅给劳动力接纳地增加了压力，而且中国人所展现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使俄国人感到吃惊。他们开始对赴俄苦工采取排斥的措施。秉持小农经济理念的中国官府，对大量涌入东北的苦工非常担忧，尤其是对不从事农业者，总认为他们可能是未来地方动乱之源，始终有防范之心。他们虽不愿意将这些苦工融入到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但亦无能对此做些什么。出关的苦工正是在俄国人排斥、中国官府不管的情况下艰难谋生。

大量的中国劳动力进入远东地区，冲击了俄国人的生计，引起了俄国人排外的情绪。1908年，滨海和阿穆尔两省俄国居民达到50万人时，中国人已有8万多人。而全部俄罗斯居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具有劳动能力，与中国人数相当。对于这种状况，俄国人非常关注，他们注意到：

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城市里的居民，住的是中国工人用满洲木材盖的房子，屋里用的是中国红砖砌成的炉子。大清早，满洲人瓦尼卡就把水打来，中国工人在厨房里支起土拉制做的水火壶（这可能是

家庭里惟一不是黄种人制的东西），人们喝的是中国茶叶，吃的是用中国面粉在有中国人干活的面包坊里制作的面包。接着中国人和朝鲜人开始挨户送自己的农村产品：鸡蛋、蔬菜、上海水果等。中国工人上市场去买蒙古肉来做午饭，家庭所需一应日用杂品都要到附近的中国店铺去买。这种店铺分布在每个十字路口。这家主人的老婆穿的是中国裁缝做的丝绸连衣裙。劈烧柴、干家务，都是满洲人和朝鲜人……^⑤

俄国人认为，中国人“今天蜂涌而来，明天结伴而至，永无休止，来出卖他们的廉价劳动，在不堪设想的不文明中度日，也根本不想改变生活条件，然而却从我们的边陲拿走大量的俄国的血汗。”这种状况促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中国人的内在力量、生命力和工商业方面的竞争能量，认为这些特长比中国的陆军和海军更危险。^⑥

为防止华工的涌入，俄国人采取了若干措施。内政部颁布的统一侨民法，规定从1910年1月1日阿穆尔地区国家工程中禁止使用外籍工人，只有在期限紧急而国内工人不足，致使工程不能如期完工的情况下才准许招募外国人。但当时由于阿穆尔铁路工程急需大批华工，为此国防部提议至少在该铁路建成以前不要执行上述规定，后经国家杜马讨论决定将该项决定推迟一年执行，即至少在1910年10月1日前不得执行。^⑦可法令归法令，执行起来则是另一回事。毕竟华工的工资相当于从事同种工作的俄国工人的60%。正如枢密官伊万尼茨基所说“使用黄色民族的廉价劳动力，当前大概已成无法改变之事。而且我本人亲眼看到朝鲜人和中国人无处不有。至少是在我所到过的远东各地，这些异族人的劳动力已进入大多数私人或官办的企业，铁路建设和军事部门建设也不例外。”^⑧

进入俄境的华工，多以开矿、耕地或小本营业及私贩货物为生活，但也有迫不得已流为贼匪，贻害地方的。^⑨黑河左岸俄境的华人营正业者十九，籍雇工自给，也有游荡者辄开烟馆、设赌摊，此辈踪迹尤到处皆是，“该地烟馆与赌局必相依附，入其中，交相陷害，常至

贫困，无以自存”。^⑧1911年，俄境内华人中无业游民增多，以致“阿穆尔及西比尔全境，枪杀之案层出不穷，胡匪之猖獗日甚，边境为之不安。溯其原，无非因无业游民散布于各处，为胡匪之引线，是以攻无不破，抢无不尽，其为害未有甚于此者也”。^⑨基于对华工威胁的担忧，俄人不但利用防疫，将四千多名华工遣送回中国，而且藉口“以居留阿穆省华民而论，因人数过多，自不免有匪徒无赖混迹”，驱逐华人。^⑩

东北地方官对于大量涌入的苦工持忧喜参半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担心苦工成为流民威胁到地方治安，尤其是加入胡匪，另一方面大量苦工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机会。根据俄国阿穆尔总督辖区要求，前往俄罗斯务工的中国人必须持有由俄国领事、副领事签署的证件，领取居留票，同时缴纳票税5卢布。^⑪中国地方交涉局官员亦按照此数向赴俄劳工收取照费，“而交涉局员之私囊数万元之照费，已不期增入”。^⑫

虽然当时东北三省，尤其是黑龙江，面临招垦边荒问题，但他们不愿意在苦工中进行招垦，宁愿设立招垦局远赴外地招揽农民或移难民实边。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实际上将出关的苦工视作游民、流民，认为他们不老实、不本分，不愿意将他们迁入招垦地区为农。这种态度从东北鼠疫期间东北地方如何处置滞留当地直东苦工的电文中窥知一二。宣统二年十一月，东北鼠疫爆发，为防止疫情蔓延，地方当局阻断交通，禁止苦工出入山海关。直隶总督与山东巡抚商榷办法，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指出此项措施将使两省十数万人民失业，而“东三省及蒙古一带荒地甚多，松花江舟车可通，气候土壤极佳，善锦兆铁路不日修筑，亦待招工移民殖边”，电请“将直东两省工人陆续招往，授地垦种，为一劳永逸之计”。^⑬他们主要担心本省的稳定，不能出关谋生的十数万劳力，“虽暂可禁其外出，势难久事羁縻”，恐因饥寒而流为盗贼，危害直东安全。他们指出，“此项侨俄之华民前既不避艰苦，谋食域外，其非游惰可知，就近移送自属因地制宜，有耕地可耕，即无虑游闲酿事”。^⑭

东北地方官在应对直东交涉时，强调了苦

工对当地治安的威胁。安宁知府认为，“自古移民政策必先借给牛具、贍其妻孥，方可相安无事，否则弱者不久遁归，强者流为盗贼，未有实边之效，反有扰乱之虞。俄海滨省与吉林之东宁、虎林、密山等处，境界毗连，该游民等如能自食其力，早已有业可就，何致流离外域？是其游惰性成，已可概见。倘一旦来境，无屋可居，无食可食，势必骚扰地方，届时再图资遣，未免徒费周折”。^⑮吉林巡抚陈昭常认为，“俄境华工皆属游民，不安分者实居多，频年吉省发匪此擎彼窜，每以俄境为逋逃剿办之难，亦其一因。”他藉口“粮户雇用必须切实保证，方能收留。此时，若官为安插，在荒地则漫无布置，难以屯留；在垦户则不免多疑，不能勉强”，拒绝接纳安插直东工人。^⑯

报纸舆论亦将苦工视作对地方稳定的威胁。如《吉长日报》编辑在点评俄国修建铁路招工新闻时指出，“招工之耗一播，远道闻风至者猬集，及赴彼境，辄因人数过多，或工事将毕，无工可就则散而四方，变为猿鹤，化为虫沙，不可究矣”。^⑰《远东报》认为，前往东北做工的劳动力，虽然面临身死异地的危险，“源源而来者仍滔滔不绝”，其原因则是“利动之也”。他们虽“每日约可得金钱五角”，但却不知储积，“得一日工资即消磨于吞云吐雾之中，视为极乐世界”。时人因苦工未意识到工作并非“无尽之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感叹“其愚昧尤可痛也”。最可恶的是苦工们四处流动，“春去冬归，不知根据其地点以营其实业”，使得发匪“常挟此志以肆掠夺”。^⑱

结语

本文以宣统年间的出关苦工为研究对象，所选取的是东北移民历史的一个节点，需要从东北移民的整体历史对宣统年间的出关苦工做一些说明，以弥补认识上的不足之处。

首先，从整个东北移民历史来看，宣统年间的出关苦工处于一个转折时期，此后俄罗斯变本加厉地禁止华工入境及驱逐华工，而东北地方大力吸收苦工开垦荒地。1912年，俄国在边界地区采取外交手段严格限制华工入境，

并在俄境内驱逐华工出境。直到1915年8月，俄国政府因需要大量劳动力，始放弃限制驱逐华工政策，改为大规模招募华工。^①民国成立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残余全被扫除，过去旗人垄断的官庄、旗地以及林林总总的公有地产都予以清丈，理论上发放给移民垦殖。^②东北地方督军也不再拘泥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而是更多考量充实自身实力。^③他们在对待出关华工问题上采取了与清廷时期不同的态度，在放荒时不再考虑垦荒者来源。

其次，出关的苦工参差不齐，有着不同的结局。他们中有的移居俄罗斯，有的定居当地。他们中很多人将挣到的工资存起来，作为后来购置田产土地的资本，成为了东北开发进程中的地主或自耕农。^④经过若干年后，他们定居当地，成为了移民，而非春来冬归的苦工。当然，有的苦工最后成为流匪，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东北胡匪问题。诚如赵中孚所言，

① 在官方电文中称之为“苦工”或“小工”，报纸上多称之为“苦力”，如《禁止苦力来东问题》（宣统三年二月十八日《盛京时报》，第2版）。

② 参见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299页。

③ 笔者认为，流民、游民与苦工的区别在于，前者靠乞讨为生，而后者以劳动挣工资为生。每年，出关的人群中混杂有大量的流民。据报载“山东河间难民每年春际外乞而归，甚有携眷担裹筐车满载者，其大股有二三百，小股三五不等，而资以生活矣。每至城镇、村庄，无论衙所、铺户，稍丰富者强讨硬乞粮米三五斗，或钱数十至十余吊不一。设或抗拒，则卧门塞巷，叫嚣唐突，种种恶剧，不可言喻。而新正以来，入关难民统计已有五千余名。”参见《难民与治安》，宣统二年二月初八日《吉长日报》，第5版。

④ 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包括：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和《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续）》，《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1、22号；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东北集刊》1943年；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年；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4册下，1974年；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学者还对赴俄华工做了专题研究，李永昌专文论述了19

“一时移民及苦力成员之不甘领受揽头盘剥及官吏土豪欺凌者，纷纷扬弃传统社会规范，对抗政府律法，自行其是；甚或转为匪类，以图发展”。^⑤

最后，从经济发展来看，宣统年间关外的经济状况处于较好时期。我们知道，出关苦工的流向具有很大盲目性，往往是通过同乡口舌相传而获得信息。某些人先去东北谋生，回家乡后将东北情况介绍大家，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此村人士传之彼村，亦有全村相率移往满蒙的”。^⑥与此同时，俄罗斯财政经济恶化，巨额债务迫使政府减少远东的建设项目，使得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减少。这样一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口出关谋生，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力供给超过了需求，导致工资下降。如黑河由于劳动力日多，价格低落，“工价最高日不逾五六角，甚至三角二角不等。”^⑦

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赴俄华工的历史，值得指出的是该文主要采用了俄文资料（《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王晓菊在《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对赴俄华工做了详细描述。

⑤ 执无《直鲁移民与满洲经济》，《现代评论》第6卷第133期，第6页。

⑥ 《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13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档甲34。

⑦ 《日人论禁止苦力渡满问题》，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远东报》，附张之三。

⑧ 直隶、山东两省出关十数万人中，“在俄境者约十之九，在东三省者约十之一，春往冬回，习以为常。”《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13册。锡良认为，山东省“小工远来关外在俄境中做矿工者居多，耕地者不及十分之一二”。《致济南孙慕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13册。“山东人十之八九在俄境担任矿工，每月收入有50卢布，并不喜欢垦殖。”《致天津陈筱帅、济南孙慕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13册。另据报载，“东省远来之工人其目的约有三事：1、缝衣；2、淘金；3、巧工。缝衣多上海、宁波人，本有专科之执业，自可无庸过虑，而淘金及巧工则半为邻省之贫民，其目的多住在

俄地”《满洲安置华工议下》，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远东报》，第1版。

⑨ [日] 满洲史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辽宁编写组译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册，1988年编印，第208页。

⑩ “1900年时，铁路区域中之俄国工人、俄国职员及警备队共六千人，而当地原有及新来的中国人多至六万”。参见 [苏] 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上海商务书局1937年版，第204页。

⑪ 《凤凰朱丞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14册。

⑫ 胡斌 《农村劳动力流动动机及其决策行为——兼析外出与不外出打工劳动力收入逆差的形成》，《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⑬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37页。

⑭ 李文昌 《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215页、217页。

⑮ 徐恒耀 《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第32页。

⑯ 《山东烟台手工业工资（1902—1911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4页。

⑰ 高凤章、何树毅编 《奉天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第2期第1册，宣统二年版。

⑱ 本文货币单位采用大洋元，按照《奉天省城最近之商情》一文中《外国货币兑换表》的汇率进行换算。参见李政、陶镛《奉天省城最近之商情》，《实业杂志》1912年第2期，第30页。

⑲ 陈翰笙、王寅生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1号，1929年，第8页。

⑳㉑ 《山东省手工业每日工资（1910—1913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86页。

㉒ 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1页。此处原为0.423日元，按照日元与大洋汇率1:1.11计算得此数字。

㉓ 转引自李永昌《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215页。

㉔ 俄国煤矿华工日工资为1卢布，按照卢布与大洋汇率1:1.14计算得此数字。

㉕ 巴比切夫 《中国与朝鲜劳动者参加远东地区的国内战争》，第13页，转引自李永昌《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215页。

㉖㉗㉘ 《华工转徙边外记》，宣统二年五月初七日

《吉长日报》，第5版。

㉙ 《华工转徙与其生计状况》，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吉长日报》，第5版。

㉚ 《直隶景县手工业工资》（1890—1910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84页。

㉛ 原文所用的是东北小洋，笔者按照时价“每小洋一角换铜元十二枚”（李政、陶镛《奉天省城最近之商情》，《实业杂志》1912年第2期，第29页），“每元合铜元一百四十枚”（《山东省物价》，《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85页），进行换算得出的结果。《大连手工业工人每日工资》（1902—1911年），《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86页。

㉜ 在俄苦工日工资资料来源有二：一是黑河一带“每日雇工价值不下俄洋七八角，多者能达一卢布”（《华工转徙边外记》，宣统二年五月初七日《吉长日报》，第5版）。一是“木石华工只有70戈比到1卢布”（巴比切夫《中国与朝鲜劳动者参加远东地区的国内战争》，第13页，转引自李永昌《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215页）。此处取上述日工资的中间数0.8卢布计算。

㉝ 吴希庸认为高工资是俄国人吸引华工的重要手段。参见《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第2期，1941年，第30、31页。

㉞ 《黑龙江省招垦白话广告》，《黑龙江省边垦案》，第67—68页。

㉟ 黑河府王守曾致电锡良指出，“彼岸华工皆直东籍，每年约数万人，大都于开冻时搭轮前往，亦有由陆而来者。”《致天津陈筱帅、济南孙慕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13册。每年直东贫民经爱珥“赴俄境各金厂谋生者，约两万上下之数”《爱珥姚道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6册。嫩江为“赴俄通衢，每年直东两省小工经过者不下数万。”《嫩江王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6册。

㊱㊲ 王晓菊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第136页，第131页。

㊳㊴ 《华工赴俄盛况》，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吉长日报》，第5版。

㊵㊶㊷㊸ 《华人在俄之现状》，宣统二年九月九日《远东报》，第1版。

㊹㊺㊻㊼㊽ [俄] 保尔霍维季诺夫著，姜延祚译《俄国远东的中国人》，《黑河学刊》1985年第4期。

㊾ 俄国政府派遣了以戈拉韦为首的黄种人考察队调查统计，1910年，约有15万中国人成为俄罗斯远东的常住居民，比1893年增加了42倍，他们在当地总

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少于 12%。转引自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第 136 页。

④⑩ 1911 年初，新任阿穆尔俄行政长官关达基氏条陈俄政府谓“阿穆尔沿边移住华人已达六万五千之谱，沿海洲亦有六万九千余人。”《俄人驱逐华侨之原因》，宣统三年二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 5 版。

④⑫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41 页，第 1183 页。

⑬ 《饬三省各府厅州县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3 册。

⑭ 《洮南孙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4 册。

⑮ 《通化潘令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4 册。

⑯ 《海龙吴守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八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5 册。

⑰ 《新城刘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⑱ 《宁安熊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⑲ 《富锦炳令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⑳ 《长北田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4 册。

㉑ 《凤凰朱丞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4 册。

㉒ 《新民张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本省各属电》第 14 册。

㉓ 《黑河王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 6 册。

㉔ 《木兰于令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 6 册。

㉕ 《额穆令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㉖ 《阿城谭令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㉗ 《哈尔滨林丞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㉘ 《吉林傅守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㉙ 《桦川孟委员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㉚ 《五常汪守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3 册。

㉛ 《陈简帅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4 册。

㉜ 《呼兰王守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 6 册。

㉝ 《巴彦杨牧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黑龙江来电》第 6 册。

㉞ 《致天津陈筱帅、济南孙慕帅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 13 册。

㉟ 《俄人亦拟禁止华工耶》，《广益丛报》1910 年第 239 期。

㊱ 《侨俄华工生计》，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吉长日报》，第 5 版。

㊲⑧⑨ 《俄路又招华工》，宣统二年六月初七日《吉长日报》，第 5 版。

㊳ 《华人在俄之现状（续）》，宣统二年九月十日《远东报》，第 1 版。

㊴ 温捷尔贝尔格《阿穆尔沿岸地区（1908—1911 年）》，彼得堡 1912 年版，第 79—80 页。转引自李永昌《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 220 页。

㊵ 《俄人驱逐华侨之原因》，宣统三年二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 5 版。

㊶⑳ 《论阿穆尔居留之华民》，1911 年 8 月 25 日《远东报》，第 1 版。

㊷⑲ 参见李文昌《中国近代赴俄华工述论》，第 220 页，第 218—224 页。

㊸ 《天津陈筱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 13 册。

㊹ 《天津陈筱帅、济南孙慕帅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八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外省来电》第 13 册。

㊺ 《陈简帅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4 册。

㊻ 《陈简帅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十日），《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吉林来往电》第 24 册。

㊼ 《满洲安置华工议下》，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远东报》，第 1 版。

㊽⑳ 参见赵中孚《近代东三省移民问题之研究》，第 653 页，第 648 页。

㊾ 吴希庸在《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中指出“因有较优之劳动机会，常能微有继续，以为筹备久居之底款。”

㊿ 赵中孚《近代东三省发匪问题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 7 期，第 512 页。

①② 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第 32—33 页。